

欧洲中世纪文学话语体系的探索与重构——论刘建军中世纪研究的成就与贡献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Paradigm Reconstruction: Liu Jianjun's Contributions to European Medieval Literature Studies

李立新（Li Lixin） 杨兴隆（Yang Xinglong）

内容摘要：刘建军是我国中世纪文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其学术视野宏阔，理论素养深厚，对该领域的研究方法、学术范式和话语形态做出了系统性、开创性的贡献。他以辩证的批评意识和创新的研究视角，驳斥文化断裂论、“废墟论”与西欧中心论，强调此时期文学的社会功能与审美自主性的统一，提出了以“文化整合”为核心的中世纪文学动态发展观。他从方法论、文化批判、历史维度、审美价值与知识生产五个维度，重构了中世纪文学的知识体系与价值谱系，拓展出新的学术生长空间，对当代外国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发意义。

关键词：欧洲中世纪文学；刘建军；文化整合；范式重构

作者简介：李立新，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19世纪英国小说、博物馆文化、知识分子研究；杨兴隆，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英语文学。本文系山东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詹姆斯·乔伊斯小说的中国书写”【项目批号：21CWWJ06】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Paradigm Reconstruction: Liu Jianjun's Contributions to European Medieval Literature Studies

Abstract: As one of the pioneering scholars in the study of European medieval literature in China, Liu Jianjun has made systematic and innovative contributions to research methodologies, academic paradigms, and scholarly discourse in the field. Grounded in a dialectical critical consciousness and sustained theoretical reflection, Liu challenges long-standing assumptions such as theories of cultural rupture, ruins-based interpretations, and Western Eurocentrism. He emphasizes the intrinsic unity between the social function and aesthetic autonomy of medieval literature, and advances a dynamic model of literary development centered on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From five interrelated dimensions, namely methodology,

cultural critiqu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esthetic value,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 Liu reconstructs the knowledge framework and value genealogy of medieval literary studies, thereby opening up new avenues for academic inquiry. His scholarship offers important theoretical insights and serves as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contemporary research in foreign literature.

Keywords: European medieval literature; Liu Jianjun; cultural integration; paradigm reconstruction

Authors: **Li Lixin**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Her primary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19th-century British fiction, Museum Culture, Intellectual Studies, and Religious Culture (Email: lixin@sdu.edu.cn). **Yang Xinglong** is a Ph.D.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His primary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Contemporary English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Criticism (Email: yangxinglong@mail.sdu.edu.cn).

考察刘建军在欧洲中世纪文学研究方面的贡献，需将其著述置于中国学术演进的不同阶段中予以评判。同时，又应具有学科范式的观照，以了解他的那些在不断发展中具有典范意义的学术思想。欧洲中世纪文学研究长期存在“黑暗时代”论与“二希”（希腊与希伯来）文化决定论，致使该领域存在认知误区与方法论局限。在“废墟论”影响下，中世纪被诠释为横亘于西方古典文明与文艺复兴之间的一道断裂带，其文学的历史价值亦因此遭到否定。这种粗放的线性史观不仅遮蔽了中世纪文化主体的建构过程，更未能充分呈现其作为文明转型枢纽的深层意义。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在《批评的解剖》（*Anatomy of Criticism: Four Essays*, 1997）提出的“原型批评”（Archetypal Criticism），将《圣经》的象征意象视为“文学原型的语法”（grammar of literary archetypes）¹，这一观点导致中世纪文学被简化为《圣经》原型的被动衍生物；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解构主义则掩盖了中世纪文本的“基本的连续性”²；而C.S.路易斯（C.S. Lewis）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深受中世纪和古典时期的影响”（Armstrong 3），却未能有效整合蛮族文化基因、阿拉伯文明中介等多元要素的共生互动。这些研究路径或割裂历史脉络，或简化理性与信仰的辩证关系，难以揭示中世纪文学的内在丰富性与历史性。

刘建军长期深耕西方基督教文化与欧美文学发展史领域，其代表性著作《欧洲中世纪文学论稿（从公元5世纪到13世纪末）》（2010）³堪称当代

1 参见 Northrop Frye, *Anatomy of Criticism: Four Essay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135.

2 参见 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32页。

3 下文皆用《论稿》简称。

中国学术界欧洲中世纪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曾提出“范式”（Paradigm）的概念，强调典范在科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指出“取得了一个范式，取得了范式所容许的那类更深入的研究，是任何一个科学领域在发展中达到成熟的标志（……）向新范式的转变便是科学革命”（12-13、90）。可见，新科学革命的发生，首要的是典范的革命，即先前的典范在革命后为另一典范所取代。刘建军从方法论革新、文化批判与社会介入、历史深化、审美价值重释、知识生产系统构建这五个维度对欧洲中世纪文学的传统界定进行了革命性的重构。他所构建的研究体系，不仅纠正了受西方理论话语影响的认知偏差，拓展了中世纪文学的研究版图，还破解了中世纪研究的学术困局，兼具里程碑式的学术价值与服务当代文化建设的现实意义。

一、独辟蹊径：确立中世纪文学的“新创”定位

构建欧洲中世纪文化与文学研究面临的问题和现状，是推动具有中国学术风范的中世纪文化话语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关键。刘建军深入到中世纪文学发展的历史根因、文化根因与逻辑根因的文脉之中，尤其在文化根因的探索中保持批判的自觉性，以传统“废墟论”“西欧中心论”及“研究范式静态化”为切入点，重新确立了中世纪作为文明转型阶段的重要地位，还原其多元发展脉络。

刘建军秉持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他看来，要解决基督教文化认知中存在的静态化问题，必须将其置于历史发展中进行考察。¹“自中世纪以来，欧洲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走过了一条对基督教‘顶礼膜拜—反思与反叛—回归与超越’的变迁之路”（肖四新4），但刘建军通过梳理基督教文化自身的三段演变轨迹，揭示了其与文学发展的深层互动机制。他指出，第一阶段是文化整合初期：中世纪早期基督教作为民间信仰在混乱社会中起到提供秩序和希望的作用，这与文学中救赎与希望的主题相符；第二阶段是文化发展期：基督教成为构建和维护封建统治意识形态的工具，文学主题转向秩序与服从；第三阶段是文化繁荣期：基督教文化内部出现人文主义萌芽，文学主题转向人性与信仰的平衡。²刘建军以治学的严谨性与开拓性，通过对这三个阶段的精妙梳理，清晰地展现基督教文化的演变如何推动文学主题的发展。这种历史与文学的双向互动，不仅证明中世纪文化内部的矛盾与斗争是推动其发展的动力，还表明文学具有反作用于宗教文化的功能，反思并突破了传统学界将基督教文化理解为固定不变的教义框架、并据此把文学简化为宗教观念被动反映或单向传递媒介的研究范式。

另一重要贡献是拓展中世纪文学研究的学术版图，将被忽视的文化边缘

1 参见 刘建军：“基督教文化与西方社会发展三题”，《燕赵学术》2（2013）：165。

2 参见 刘建军：《演进的诗化人学——文化视界中西方文学的人文精神传统》，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27-156、156-185、189-247页。

区域与文学现象重新纳入研究视野。鉴于传统研究深受西欧中心主义影响，往往忽视东欧（拜占庭）、北欧、近东及阿拉伯等地区的文学成就，且对修道院书信、拜占庭史传等边缘文类等缺乏关注，致使中世纪文学图景存在结构性缺失与区域失衡的问题。对此，刘建军将上述文化圈纳入考察范畴，通过更全面、客观的视角审视欧洲文学的整体面貌，勾勒出一幅较为精准的中世纪文学全景图，深刻揭示了该时期文学多元共生的新质特征。

众所周知，拜占庭帝国所保存的古希腊、古罗马史料与思想资源，为中世纪欧洲突破天主教神权束缚提供了最直接的动力，进而引发了文艺复兴运动，并深远地影响了人类历史。对此，刘建军进一步揭示其在接受、转化与重构古典文化过程中的能动性，指出古典传统正是在这一历史机制中获得延续与新生。普罗柯皮乌斯（Procopius）于6世纪中叶完成的《战争记事》（*The Wars*）集中体现了这一文化特征：作品在叙事方法上延续了希腊史学重视事实与见证的写实传统，同时在历史解释层面融入基督教的神意史观，形成了历史与宗教相结合的独特风格。作品中对君士坦丁堡城市建设、帝国政治秩序及其与波斯之间经济往来的描绘，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也生动展现了东欧文化传统与基督教文明在拜占庭语境中的深度融合。若将拜占庭文学排除在中世纪文学研究之外，既遮蔽了古典文化在中世纪的真实流转路径，也在方法论上固化了以西欧为中心的单一叙述框架。

刘建军也详细考察了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文化对中世纪文学的作用，并对萨迦文学进行了深入挖掘，发现其民族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相融合的现象，揭示了北欧文学的独特价值。他指出，这种文化融合并非简单的叠加，而是北欧民族在接受基督教文化时，将本民族的文化基因与宗教思想相结合的结果。¹例如，13世纪末“冰岛萨迦”中的《尼雅尔萨迦》（*Njal's Saga*），以家族复仇为主线，却在结尾处加入基督教法官调解冲突的情节，既体现了北欧文化的复仇传统，又反映了基督教和平、宽恕观念对北欧社会的影响。²可见，他的北欧萨迦文学研究，填补了中世纪文学研究中非西欧区域的空白，展现了中世纪文学的多样性与地域特色。

刘建军还关注中世纪的西欧世俗文学，并揭示了欧洲中世纪世俗文学与基督教文化之间“圣俗相依”的特征。例如，中世纪的骑士抒情诗，既未继承希腊罗马的抒情诗传统，也不同于希伯来的宗教诗歌，而是结合了蛮族文化的英雄崇拜与基督教文化的精神追求，形成了独特的典雅爱情主题。³比如12世纪末法国骑士诗人克雷蒂安·德·特鲁瓦（Chrétien de Troyes）的《朗斯洛，或坐囚车的骑士》（*Lancelot, the Knight of the Cart*），是以朗斯洛对

1 参见刘建军：“冰岛萨迦文学简论”，《社会科学战线》6（2003）：116-120。

2 参见刘建军：《论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42-243页。

3 参见刘建军：《论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11页；刘建军：“欧洲中世纪史诗的历史文化阐释”，《北方论丛》3（2009）：85-91；刘建军：“论12世纪西欧文化复兴运动”，《北方论丛》6（2003）：41-45。

桂妮薇儿的爱情为核心，将世俗爱情与宗教虔诚相融合，从而开创了骑士浪漫主义的新范式。此外，中世纪的市民故事以世俗生活为题材，突破了宗教文学的题材限制。同时期的宗教戏剧，多源于教堂仪式，与希腊戏剧的酒神节起源截然不同，通过舞台表演将宗教故事转化为大众可感知的艺术形式。这些文学新样式并非废墟上的重建，而是中世纪文化整合各类文明后的原创性成就，为西方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主题、形式与手法。刘建军在研究中还涉及修道院情书这一被边缘化的文学现象，指出这些出自僧侣、修女之手的情书，书写出了中世纪的神职人员从宗教的角度探索人性发展历程的篇章，证明了中世纪文化并非纯粹的神性压制人性，而是充满了人性与神性的张力。这些情书虽以宗教语言为外衣，却真实表达了僧侣、修女对情感交流的渴望，体现出了特有的灵性的情谊结构。¹对这些边缘文学现象的关注，不但丰富了中世纪文学研究的内容，还推动了该领域从单一中心向多元整合的研究转型。

上述诸多的提法、观点、分析、定位，已经不断被学术界沿袭或吸取，逐渐成为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研究范式，这形象地诠释了库恩对范式的定义：“一个科学共同体是解决它的范式所规定的问题或谜题的极为有效的工具。而解决这些问题的结果必然是进步”（166）。从“新创”这个层面看，刘建军的贡献不仅在于开拓了学界视野、发掘了新的学术增长点，更在于其不拘旧习、力避陈见、独辟蹊径的学术精神，有力推动了中世纪整体研究风气的更新。

二、多元范式：构建动态融合的研究框架

传统中世纪文学批评长期局限于结构决定论、解构主义、二元对立的思维范式，难以揭示文学与文化的辩证互动关系。对此，刘建军以辩证历史意识为核心，构建出了多维度动态融合的研究框架。这一方面表明他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深厚的学术积累、扎实的学术功底以及敏锐的学术感知力，凸显了他作为一代学术大家的治学风范。另一方面，更是见前人之所未见，为这个文学领域内孕育了新的学术可能，并激活了学科研究的新动力，有着创制之功。

第一个范式创新点是超越原型批评的结构决定论，强调文学对宗教的反向重构。在弗莱看来，文学作品本质上只是神话向世俗世界的“位移”（displacement），而这一过程的深层结构原型主要源自《圣经》。²在以往研究中，无论是中世纪宗教诗歌还是戏剧，都不过是亚当堕落、基督救赎等圣经故事的重复演绎。换言之，中世纪文学始终被动地接受宗教框架的内容设置，缺乏对宗教文化的主动改造能力。这种结构决定论虽揭示了宗教与文学

¹ 参见刘建军：“欧洲中世纪修道院情书文学价值论”，《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2011）：107-109。

² 参见 Northrop Frye, *Anatomy of Criticism: Four Essay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135-138.

的关联，却忽视了文学在文化传播中的能动性。刘建军先后在“欧洲中世纪文化与文学述评”和“对欧洲中世纪文学几个关键问题的再认识”等文中明确反驳了以上观点，提出“文学对宗教的反向重构”理论。他以中世纪宗教诗歌为例，指出这类作品通过文学创作重构宗教的传播形式与文化内涵。¹这种反向重构并非背离宗教本质，而是一个以文学自身特性推动宗教文化本土化的过程，展现了文学在文化互动中的主动地位²，揭示出中世纪文学并非宗教的附属品，而是通过文化基因重组实现精神转变的能动主体。

第二个研究范式的创新表现在注重文化基因的连续性，区别于解构主义对确定性的消解。雅克·德里达在《论文字学》（*De la grammatologie*, 1967）中提出“任何文本，包括那些被视为神圣的文本，其意义都不是稳定、封闭或确定的，而是处于一种永恒的、开放的运动和播撒（dissémination）状态之中”（88-89）。解构主义虽打破文本权威崇拜，却导致历史脉络断裂，由此刘建军通过对其核心概念“分延”（同“延异”）和“播撒”的特性分析，强调《圣经》及中世纪宗教文学的意义始终处于流动状态消解了中世纪文化与后世西方文化的基因连续性。³刘建军以《神曲》（*The Divine Comedy*）为例论证人文精神的传承：指出该作既融合了基督教逻各斯与古典理性，实现了双重传统的辩证统一，又借由政治批判与人性审视，完成了宗教思想向世俗价值的现实转化。⁴《神曲》中“精神与现实相统一”的基因，在莎士比亚与《浮士德》中得到延续，从而勾勒出从神本向人本演进的文化脉络。这一洞见兼具史学深度与现实意义，构成了其研究体系中的又一亮点。

第三个研究范式的创新是打破传统二元对立模式，建立宗教与世俗的动态融合视角。刘建军指出，传统研究将宗教文学与世俗文学视为两个相互排斥的范畴，常陷入宗教文学与世俗文学的二元对立模式，却忽视二者之间的渗透融合。⁵如骑士文学中表现出的对宗教信仰与世俗爱情共存现象的简单理解，实为后世研究的误读。为此，刘建军打破了这种对立，提出宗教与世俗动态融合的研究视角，将其命名为“圣俗相依”。⁶他以11世纪末的法兰西史诗《罗兰之歌》（*The Song of Roland*）为例，详细剖析了“圣俗相依”体现出的辩证统一思想，罗兰作为骑士，既坚守对君主查理曼的忠诚（世俗伦理），又

1 参见 刘建军：《论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84页；刘建军：“对欧洲中世纪文学几个关键问题的再认识”，《外国文学评论》4（2010）：231-238。

2 参见 刘建军：“欧洲中世纪文化与文学述评”，《外国文学研究》1（2003）：144。

3 参见 刘建军：“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价值走向”，《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2006）：82-89。

4 参见 刘建军：“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人学观与但丁创作”，《外国文学研究》3（2000）：58-60。

5 参见 刘建军：《论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页。

6 参见 刘建军：“圣俗相依：启蒙运动与基督教文化关系谈”，《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3（2014）：1-6。

将战斗视为捍卫基督教信仰的神圣使命（宗教信仰），二者统一于作者对骑士精神的塑造中，宗教为世俗行为赋予神圣意义，世俗行为则为宗教信仰提供现实载体。¹通过对上述文学案例的剖析，表明中世纪世俗文学始终在基督教文化语境下，与宗教文学相互渗透、互为补充。这一动态融合视角不仅符合当时的文化实际，更为阐释该时期文学的多样性提供了方法论支撑。

概言之，刘建军提出了中世纪文学研究的反向重构论、辩证传承观、圣俗相依论等新范式，不仅匡正了原有研究存在的问题，还把握学术动向，将文学研究与西方文化紧密相连。他是在整体把握中世纪历史与文化的前提下讨论中世纪的文学，这表明其在学术研究上的大格局，同时也提醒外国文学研究者在各自领域的研究中应注意掌握话语权，将西方典籍与个体思考相融合，坚持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研，进而建构紧跟时代的理论话语。²在中世纪文学研究中，刘建军对同属于欧洲中世纪文学的拜占庭文学不仅做出了系统解读，还站在中国学者的立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与方法，科学梳理了拜占庭文学的起因、发展和影响，并对其重要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尤其针对一些重大问题：如古希腊文学与拜占庭文学之间的关系、拜占庭文学与西欧中世纪文学之间的差异以及拜占庭文学的基本性质、文化要素以及审美方式等，刘建军亦贡献了既具创新性又契合实际的论述。

三、路径开创：中世纪文学研究体系与框架的重构

针对传统的中世纪文学研究困境，刘建军提出整合多元文化来源、划分动态发展阶段、构建问题导向范式三大路径³，为中世纪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知识框架与方法论模板。具体而言，针对中世纪“文化来源单一化”的偏见，他明确指出，中世纪文化是多种古代文明融合的产物⁴，绝非仅源于“二希”文化；对于中世纪历史阶段模糊化论断，他反对用“黑暗时代”笼统地概括整个中世纪，主张划分动态发展阶段，强调其内部不同阶段的演进与差异；面对“研究范式静态化”的困境，他指出研究不应是静态描述现象，而是以关键问题为驱动，深入剖析文化转型与融合的内在机制。⁵

传统学界对中世纪文学文化来源的研究，多局限于“二希”文化，忽视了蛮族文化、阿拉伯文化等其他要素的影响。比如将骑士文学的英雄精神仅

1 参见刘建军：“欧洲中世纪史诗的历史文化阐释”，《北方论丛》3（2009）：85-91。

2 参见刘建军：“‘中国意识’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前提和关键所在——以《拜占庭：东罗马帝国文学史》的写作为例”，《外国文学研究》5（2024）：19-23。

3 此框架在《论稿》目录中具象化为三编结构：来源论、演进论、成就论，构成迄今最系统的中世纪文学研究方法论模板。

4 参见刘建军：“欧洲中世纪文化与文学述评”，《外国文学研究》1（2003）：142-146；刘建军：“拜占庭的历史文化特色与文学成就”，《外国文学研究》2（2009）：143。

5 参见刘建军：“欧洲中世纪文化与文学述评”，《外国文学研究》1（2003）：142-143。

归因于希腊文化，未认识到蛮族文化对此做出的贡献；将中世纪神学文学的理性思想归因于希伯来文化，忽略了阿拉伯文化的影响。刘建军的研究整合了希腊罗马文化、希伯来文化、蛮族文化、阿拉伯文化等多元要素，建立了系统的中世纪文学“文化来源”知识体系，这不仅丰富了文学研究的内涵，还架设了文学与美学、国别区域研究之间的桥梁。

在希腊罗马文化来源方面，中世纪将希腊的世俗理性改造为服务于宗教信仰的神学理性。但刘建军强调，中世纪文学将希腊罗马的世俗理性与基督教的宗教信仰相结合，形成了理性与信仰相统一的文化基因。¹ 在希伯来文化来源方面，中世纪文学对希伯来文化的吸收是积极的、创造性的本土化改造而非被动接受，对犹太教文化要素的接受是改造与重塑的过程而非简单复制，这使得希伯来文化的核心观念能够与欧洲本土的精神需求相契合。在蛮族文化来源方面，它“并非‘野蛮’的代名词，它有其自身的文化成就与特征（……）欧洲中世纪在对蛮族文化进行改造的同时，也继承和吸收了其英勇、忠诚、部落共同体等观念，这些成为了中世纪文学尤其是英雄史诗的重要精神内涵”（《论稿》 72-75）。他指出英雄史诗中的英雄崇拜和部落伦理等要素均源自蛮族文化，而其中的英雄精神与基督教文化的牺牲精神相结合，形成了中世纪英雄史诗的独特主题。² 这种融合使蛮族文化从原始部落文化转化为中世纪文明的组成部分，为中世纪文学注入了勇武与信仰结合的新内涵。另外，阿拉伯文化通过“翻译运动”（即将希腊罗马著作翻译成阿拉伯文再传入欧洲）为中世纪文学提供了理性思想与逻辑意识。³ 阿拉伯文化西传为欧洲带来了新的知识要素和思想刺激，特别是在哲学和科学领域，阿拉伯学者保存和注释的古希腊著作，以及他们自身的理性思想，对中世纪欧洲的学术复兴起到了关键的桥梁作用。⁴ 刘建军对多元文化来源的整合研究，揭示出彼时基督教文化作为先进文化的统筹和整合影响，“从而在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基础上接受了基督教，并对教义进行了阐释，形成了基督教名义下不同的宗教流派或曰文化形态”（“拜占庭文化的历史价值新论” 79）。这就解释了多元文化何以能融合成一种新质的中世纪文化，构建了完整的中世纪文学文化来源的知识体系，为理解中世纪文学的复杂性提供了科学依据。

关于拜占庭文学与西欧中世纪文学的关系问题，刘建军认为，应该重新认识和评价欧洲中世纪文化与文学的精神内涵构成乃至对后世的影响。⁵ 拜占庭文学是在继承古希腊文化的遗产上发展起来的。这说明，虽然同为欧洲中世纪文学，东西方却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以古希腊哲学与基督教文化相结

1 参见 刘建军：《论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8页。

2 参见 刘建军：《论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15-216页。

3 参见 刘建军：《论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82-84页。

4 参见 刘建军：“阿拉伯文化对欧洲中世纪文化的影响”，《北方论丛》4（2004）：98-102。

5 参见 刘建军：“拜占庭的历史文化特色与文学成就”，《外国文学研究》2（2009）：135-143。

合形成的东正教文化形态，完全不同于以日耳曼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结合形成的西欧中世纪天主教文化形态，更不同于后来以凯尔特文化为基础形成的新教文化形态。与之相关的是两场文艺复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等问题：在公元13世纪末至16世纪末，西欧发生了“文艺复兴运动”；而在12世纪，拜占庭帝国也发生了一次“科穆宁文艺复兴”。前者是新兴市民阶级发起的、用新思想体系取代封建神学体系的一场伟大的人文主义思想文化解放运动，后者则是大规模收集、整理和阐释古希腊罗马古典文化典籍的学术运动。恰恰是拜占庭这场文艺复兴运动，为西欧的文艺复兴直接提供了古代思想文化资源。

尤为可贵的是，刘建军构建了以问题导向的研究范式，为中世纪文学研究提供方法论模板。传统中世纪文学研究多采用“按体裁分类”或“按时间罗列”的静态范式¹，如将文学分为宗教文学、骑士文学和市民文学后分别论述，缺乏对研究中核心问题、争议问题的针对性回应，导致研究陷入碎片化，无法形成系统的学术对话。²例如，学界长期围绕中世纪文学是否为文艺复兴提供思想铺垫这个问题展开争论未能从文化基因传承、思想演变脉络等深层维度给出有力解答。刘建军摒弃平面罗列，深入内部寻找文化因子并分析其互动关系，以揭示发展规律。这种研究路径并非凭空创造，而是建立在对中世纪文学多元文本的深度解读与文化语境的精准把握之上，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可复制、可拓展的方法论模板。

刘建军的研究范式，区别于传统静态范式的无的放矢，以解决学术问题为目的，以寻找核心因子为切入点，分析其互动机制，以具体文献为支撑，主张回到文本与跳出文本的辩证方法，最终达成系统性论证，形成了逻辑严密、针对性强的研究路径。这种范式不仅适用于中世纪文学研究，更为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从问题出发、以证据说话的方法论模板。

四、功能探赜：拓展文学社会功能的实践路径

刘建军的治学始终精准把握学术脉络，更与时代同频共振。他长于将学术研究推向思想前沿，并将学术话语置于政治语境中加以审视，其中一以贯之的是对文学社会功能的高度自觉与深刻践行。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以辩证批判为核心视角，他指出中世纪文化领域内的矛盾冲突，实则是在基督教文化内部³发生的。他既客观评价了宗教文化的历史作用，又揭露其异化现象，同时系统挖掘文学对现实的反思与引导功能。

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受“废墟论”影响，大多引用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

1 参见刘建军：“欧洲中世纪文化与文学述评”，《外国文学研究》1（2003）：145。

2 参见刘建军：“论西欧中世纪文化中的变革因子”，《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1997）：68。

3 参见刘建军：“论西欧中世纪文化中的变革因子”，《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1997）：69。

(*The Peasant War in Germany*, 1850) 中关于“中世纪承受的唯一事物是基督教和残破城市”(转引自《论稿》3)的论述, 忽视了中世纪的文化延续与创新。2017年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在《我们必须给历史分期吗?》(*Faut-il vraiment découper l'histoire en tranches?*)一书明确驳斥将中世纪视作“黑暗时代”这一错误概念, 认为其源自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优越感及启蒙运动, 中世纪亦是充满活力的时期, 它继承古典遗产并进行深刻创新, 为现代欧洲奠定基础。¹刘建军不但明确反对将中世纪基督教文化视为落后反动的观点, 而且强调要历史地、辩证地看待其作用。据克里斯托弗·道森(Christopher Dawson)考证, 早期西方的修道院是黑暗时代的社会避难所、农业和手工业技术的保存地, 以及古典文献抄写的中心, 而修士们抄写的希腊罗马经典著作成为了后来欧洲文化复兴的种子。²早期基督教会在其内部实践了一种超越种族、社会地位的团契生活³, 为传统的等级秩序植入了一个否定因素, 并为后世社会观念的变革埋下了伏笔。在文学领域, 9世纪基督教诗歌, 如《少女欧拉丽之歌》(*The Sequence of Saint Eulalia*), 以抒情的方式, 既满足了民众对个体精神与理想精神相统一的需求, 又通过平等博爱的宗教观念, 潜移默化地冲击着封建时代的等级思想。⁴在古典晚期动荡中, 基督教会展现出非凡的适应性, 接管市政福利事业, 为西欧社会重组提供新框架, 而此时的基督教文化顺应了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的需求, 为社会秩序的稳定与文化的延续提供了精神支撑, 这与传统学界“全盘否定”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 展现出了辩证的、开阔的文化批判视野。

由此看出, 刘建军治学从不以简单二元论裁断复杂的文学命题, 而是在肯定与批判之间建立张力, 在继承与扬弃之中寻找平衡。他既能深入古远时代的意识形态内部, 理解其生成逻辑, 又能跳脱其外, 以清醒的审辨态度对其衍生的文学现象进行批判性重估。这种既入乎其中又超乎其外的辩证思维, 使他的学术判断始终具有理性色彩, 实现了对研究对象富有创造性的把握。

刘建军坚持在研究进程中挖掘中世纪文学的社会介入功能, 强调文学对现实的反思与引导。传统学界多聚焦中世纪文学的“宗教传播”或“娱乐功能”, 忽视其对社会现实的介入作用。例如, 形成于12-13世纪之交法国城市文化语境中的《列那狐的故事》(*Le Roman de Renart*)以动物为角色, 但其作为社会讽喻诗的价值, 正在于通过文学形式实现对现实的反思与社会价值的引导。市民文学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形态, 不仅是为了娱乐, 更重要的是

1 参见雅克·勒高夫:《我们必须给历史分期吗?》, 杨嘉睿译, 南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 第68-92页。

2 参见克里斯托弗·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 长川某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年, 第45-65页。

3 参见罗德尼·斯塔克:《基督教的兴起:一个社会学家对历史的再思》, 黄剑波等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年, 第247-249页。

4 参见刘建军:《论稿》, 北京:中华书局, 2010年, 第279页。

通过文学的形式表达市民阶级的思想感情和价值观念，通过隐晦叙事策略（如动物寓言、圣徒传记）实现了现实干预。以这部长诗为代表的市民文学作品通过幽默讽刺的手法，批判了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等级压迫与社会不公，同时传递了智慧战胜强权的市民价值观，对民众的思想觉醒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引导作用。作品中，“狮子王”象征昏庸的封建君主，“熊”代表贪婪的贵族，“列那狐”则象征机智的市民阶层。¹列那狐与其他动物的斗争，实则是市民阶层与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缩影：列那狐欺骗狮子王、戏耍熊，既揭露了封建君主的昏庸与贵族的愚蠢，也表达了市民阶层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此外，刘建军还认为在宗教文学中，无论何种体裁，其共同目的都是宣传基督观念，弘扬基督道德²，借由塑造道德典范来介入现实，引导社会道德重建。以11世纪传记文学《圣徒阿列克西斯行传》（*The Life of Saint Alexis*）为例，他指出此类作品通过圣徒放弃富贵、追求信仰和美德的故事，间接批判了当时贵族阶层的丑陋和贪婪，呼吁社会道德的重建。³

刘建军的辩证思维客观评价了基督教文化在历史进程中的积极意义，但他并未止步于肯定，而是深刻批判宗教文化中的异化现象。这种学术思路主要是源于他始终将文学视为具有社会介入功能的重要载体，致力于挖掘其对社会现实的反思、批判与引导价值，从而不断拓展文学社会功能研究的实践路径与思想深度。同时表明，他绝非埋首书斋、独善其身，其辩证思考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以学术回应现实关切，以批判推动价值重估，真正实现了学者思想深度与社会责任的高度统一。

五、审美钩沉：探勘中世纪文学的美学话语谱系

欧洲中世纪文学的审美价值因不符合世俗审美或人文主义标准而被低估，常被简化为宗教教条的传声筒，其内在的精神性审美与艺术手法创新被忽视。刘建军指出，中世纪文学在审美上并非落后，而是呈现出一套独特的价值体系，它以精神性为核心，以象征和寓意为手法，并通过对崇高的追求展现出不同于古典或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学特质，即从对外在自然的关注转向对内在精神世界的建构。⁴中世纪文学不再是僵化停滞的产物，而是人类精神开始走向自觉的第一次尝试。他在《论稿》一书中，通过崇高美重释、精神性审美界定、寓意象征分析⁵，进一步重构了中世纪文学的审美价值体系，为

1 参见 刘建军：“历史文化发展新坐标上的中世纪精神范本——《列那狐的故事》思想与艺术分析”，《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2005）：94-96；刘建军：《论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43页。

2 参见 刘建军：“基督教与中世纪文学观念的内在联系”，《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2007）：105。

3 参见 刘建军：《论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96页。

4 参见 刘建军：“基督教与中世纪文学观念的内在联系”，《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2007）：108。

5 参见 刘建军：《论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77-285、292-295、347-375页。

突破传统审美认知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

在中世纪美学价值重释层面，刘建军驳斥了传统的审美落后论，重新解读了宗教文学的崇高美。传统学界对中世纪宗教文学的审美价值评价偏低，多认为其“艺术形式粗糙”，“情感表达僵化”¹，缺乏审美感染力。在《论稿》中，刘建军以中世纪宗教诗歌和戏剧为例，指出诗歌的崇高美体现在对上帝“至高精神”的追求上，将抽象教义转化为可感知的艺术形象²，使大众便于想象和理解。就体验过程而言，审美是一种灵魂主动克制欲望、走向上帝的精神行动，是人主动进行精神抉择和努力的结果，即通过压制感官肉欲，使灵魂朝向上帝，最终获得精神家园。戏剧文学则通过描绘神圣的奇迹、殉道者的牺牲或上帝的全能，试图唤起读者类似的审美体验。比如12世纪的神秘剧通过仪式感与情感张力的结合，展现了崇高的审美价值。对此，刘建军不仅揭示了中世纪戏剧与宗教仪式的同源关系，还阐明了其仪式感的来源，为分析戏剧的舞台效果和氛围营造提供了理论依据。在他看来，宗教戏剧以教堂祭坛为舞台，以《圣经》故事为蓝本，通过演员的庄严表演和合唱队的肃穆吟唱，营造出一种宗教仪式感，展现了人类堕落与救赎的宏大主题，形成了罪恶与神圣和苦难与希望的情感张力。³这种仪式感与情感张力的结合，使观众不仅感受到宗教的神圣性，更体验到一种超越世俗的崇高美。这种追求使得文学超越了古典时期对和谐与比例的迷恋，转向对精神极致的表达。

在驳斥审美落后论的基础上，刘建军进一步对比传统的世俗审美论，从人类精神发展史的高度，论证了中世纪精神性审美转向的革命性意义。⁴以往研究多以世俗审美为核心，如古希腊文学的人体美、文艺复兴文学的人性美，忽视了中世纪文学以精神性为核心的审美特质。与传统世俗审美论强调感官愉悦和情感宣泄不同，中世纪的精神性审美的对象不再是外在自然或人体，而是上帝这一“美的本体”，其目的是借由基督教圣者的言语实现“从感官被现实俗物所控制转向了自由舒展的澄明清越的精神境界，摆脱了由于现实的缺失所带来的不安全感，获得了一种精神的体验幸福”（“基督教与中世纪文学观念的内在联系”106）。以12世纪中叶的拉丁教诲性长诗《蔑视尘世》(*De Contemptu Mundi*)为例，该诗歌视自然万物为彰显上帝荣耀的兄弟姊妹，将物质世界转化为指向神圣精神的符号。刘建军认为诗歌并非对自然景物的写实描摹，而是将自然意象转化为精神符号，引导读者从对物质世界的关注转向对精神世界的追寻。⁵读者在理解诗歌意象的过程中，体会到上帝的崇高与精神的永恒，获得一种超越世俗的审美体验。正是通过这种独特的符号化处理，中世纪诗歌才成功地将物质世界整合进精神性审美的体系之中，赋予了

1 参见刘建军：《论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84、234页。

2 参见刘建军：《论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8、192页。

3 参见刘建军：《论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24-233页。

4 参见刘建军：《论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7、278页。

5 参见刘建军：《论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86-287页。

寻常事物的神圣意涵。

骑士文学不仅将世俗情感崇高化，更将对信仰的牺牲精神转化为一种独特的审美追求。典雅爱情虽然表面是世俗情感，但其对爱情精神表达体现了灵性与肉体的互动，即将世俗情感纳入信仰框架中锤炼并升华，通过牺牲世俗尊严换取精神世界的崇高。如在前文所提及的《朗斯洛，或坐囚车的骑士》中，骑士朗斯洛所代表的审美价值并非源于勇武的外表，而是精神的坚守——为追求纯洁的爱情甘愿忍受坐囚车的屈辱，这种为信仰牺牲世俗尊严的行为展现了其崇高境界。“骑士文学开始张扬人的情欲和个性，甚至此时写定的中世纪史诗也表现出了既信奉上帝，也张扬个人勇敢的双重意韵”（“基督教与中世纪文学观念的内在联系” 101）。刘建军据此强调，这种审美特质使得中世纪文学成为内在宇宙的探索者，不再满足于模仿外部世界，而是切入灵魂深处，为文艺复兴中人文主义精神的萌发提供了准备。¹

刘建军还从艺术手法，特别是寓意与象征的审美创新角度，为中世纪文学的艺术价值正名，并澄清其对后世文学的深远影响。他认为此时文学作品中对寓意和象征的运用已达到高度成熟。²这些手法不仅是表达宗教观念的工具，更是重要的审美形式——中世纪文学借此将抽象教义转化为可感知的意象系统，帮助读者在解码中获得审美愉悦，并构建起自治的、指向精神世界的对应体系³。这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创造，标志着文学表达不再依附于其他学科。另一方面，中世纪文学通过意象的多重编码构建丰富的审美层次，使读者在解读中获得智力与情感的双重愉悦。在12世纪的道德剧中，将抽象的伦理观念人格化，内含劝善惩恶的寓意，通过直观的戏剧冲突展现道德观念，让观众在审美体验中接受教义，从而避免生硬说教。这一策略在后世寓言与讽喻文学中被反复采用，例如拉封丹寓言和奥威尔《动物庄园》所展现的以形象承载抽象观念的叙事方式，均可被视为这一艺术传统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变体。此外，刘建军直接阐述了古希腊与中世纪在构建象征关系时的根本性差异：希腊将理性与自然观察结合，产生“自然相似性”隐喻（如将“英雄”比作“狮子”）⁴；中世纪将理性与神学、社会文化结合，构建“文化关联性”象征（如将“狐狸”象征“机智”）⁵。这种差异表明，中世纪文学在艺术手法上并非继承古希腊传统，而是进行了原创性创新。通过崇高美重释、精神性审美界定、寓意象征分析，他系统性重构了中世纪文学的审美价值体系，为突破传统审美认知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

1 参见刘建军：《论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49-352页。

2 参见刘建军：《论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79-389页。

3 参见刘建军：《论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85、192页；刘建军：“基督教与中世纪文学观念的内在联系”，《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2007）：107-108。

4 参见刘建军：《论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9-30页。

5 参见刘建军：“历史文化发展新坐标上的中世纪精神范本——《列那狐的故事》思想与艺术分析”，《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2005）：97。

刘建军在中世纪文学领域的研究，以方法论创新为突破、以文化批判为视角、以历史维度为根基，构建了完整且系统的学术体系，扭转了传统学界对中世纪文学的片面认知，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他的研究，不仅填补了中世纪文学领域的诸多学术空白，更推动该领域从被动接受传统认知转向主动构建学术体系。他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不仅推动了中世纪文学的学科发展，更为当代文化建设提供了历史镜鉴：一方面，通过揭示多元文化互动与融合的内在规律，为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协调共生提供了有益参照；另一方面，通过对文学社会功能的深入阐发，为当代文学介入现实生活、引导价值取向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由此观之，他的研究树立了中世纪文学领域的一个学术标杆，亦堪称人文社科研究中立足历史、面向现实的范本。

Works Cited

- Armstrong, Chris R. *Medieval Wisdom for Modern Christians: Finding Authentic Faith in a Forgotten Age with C. S. Lewis*. Grand Rapids, MI: Brazos Press, 2016.
- 克里斯托弗·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长川某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
- [Dawson, Christopher.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Western Culture*, translated by Changchuan Mou. Chengdu: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9.]
- 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
- [Derrida, Jacques. *De la grammatologie*, translated by Wang Tangjia.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5.]
- Frye, Northrop. *Anatomy of Criticism: Four Essays*. Princeton: Princeton UP, 2000.
-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版），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 [Kuhn, Thomas S.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4th edition, translated by Jin Wulun and Hu Xinhe. Beijing: Peking UP, 2012.]
- 雅克·勒高夫：《我们必须给历史分期吗？》，杨嘉睿译。南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 [Le Goff, Jacques. *Faut-il vraiment découper l'histoire en tranches?*, translated by Yang Jiarui. Nanjing: East China Normal UP, 2017.]
- 刘建军：“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人学观与但丁创作”，《外国文学研究》3（2000）：56-60。
- [Liu Jianjun. “The Anthropological View in Medieval Christian Culture and Dante’s Work.”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3 (2000): 56-60.]
- ：“冰岛萨迦文学简论”，《社会科学战线》6（2003）：116-120。
- [—.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Icelandic Saga Literature.” *Social Science Front* 6 (2003): 116-120.]
- ：“‘中国意识’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前提和关键所在——以《拜占庭：东罗马帝国文学史》的写作为例”，《外国文学研究》5（2024）：19-23。
- [—. “‘Chinese Consciousness’ as the Prerequisite and Key to Constructing a Chinese Intellectual System: A Case Study of Writing *Byzantium: 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Eastern Roman Empire*.”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5 (2024): 19-23.]

——：“圣俗相依：启蒙运动与基督教文化关系谈”，《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3 (2014) : 1-6。

[—. “Dependence of the Holy and the Profan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lightenment and Christian Culture.” *Journal of Jilin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3 (2014): 1-6.]

——：“欧洲中世纪史诗的历史文化阐释”，《北方论丛》3 (2009) : 85-91。

[—. “Explanation of Historic Culture to the Epic in the Middle Ages of Europe.” *The Northern Forum* 3 (2009): 85-91.]

——：“拜占庭的历史文化特色与文学成就”，《外国文学研究》2 (2009) : 135-143。

[—: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Literary Achievements in the Byzantine Era.”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2 (2009): 135-143.]

——：“基督教与中世纪文学观念的内在联系”，《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 (2007) : 100-109。

[—. “The Inner Relation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the Concept of Literature in Middle Ages.” *Journal of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6 (2007): 100-109.]

——：“历史文化发展新坐标上的中世纪精神范本——《列那狐的故事》思想与艺术分析”，《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 (2005) : 92-99。

[—. “‘Le Roman de Renart’ as a Cononical Work of Middle Ages.” *Journal of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3 (2005): 92-99.]

——：“拜占庭文化的历史价值新论”，《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1 (2023) : 74-90。

[—.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Value of Byzantine Culture.” *Journal of SJTU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1 (2023): 74-90.]

——：“论 12 世纪西欧文化复兴运动”，《北方论丛》6 (2003) : 41-45。

[—. “On the 12th Century Renaissance in Western Europe.” *The Northern Forum* 6 (2003): 41-45.]

——：“论西欧中世纪文化中的变革因子”，《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1997) : 67-71。

[—. “On the Factors of Change in Western European Medieval Culture.” *Journal of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 (1997): 67-71.]

——：“阿拉伯文化对欧洲中世纪文化的影响”，《北方论丛》4 (2004) : 98-102。

[—. “On the Influence of Arabic Culture on Medieval European Culture.” *The Northern Forum* 4 (2004): 98-102.]

——：“欧洲中世纪修道院情书文学价值论”，《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 (2011) : 107-112。

[—. “On the Value of Love Letter Literature in Monastery in Medieval Europe.” *Journal of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 (2011): 107-112.]

- ：《演进的诗化人学——文化视界中西方文学的人文精神传统》。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 [—: *The Poeticalized Humanities in Evolution: The Humanistic Tradition of Western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Changchun: Northeast Normal UP, 1998.]
- ：“对欧洲中世纪文学几个关键问题的再认识”，《外国文学评论》4 (2010) : 231-238。
- [—. “Reflections on the Study of European Medieval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4 (2010): 231-238.]
- ：“欧洲中世纪文化与文学述评”，《外国文学研究》1 (2003) : 142-146。
- [—. “A Review of European Medieval Culture and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 (2003): 142-146.]
- ：“基督教文化与西方社会发展三题”，《燕赵学术》2 (2013) : 162-170。
- [—. “Three Topics on Christian Culture and Western Social Development.” *Yan-Zhao Academic Research* 2 (2013): 162-170.]
- ：“欧洲中世纪文学论稿（从公元5世纪到13世纪末）”。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 [—. *A Treatise on European Medieval Literature (from the 5th to the End of the 13th Centur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0.]
- ：“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价值走向”，《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 (2006) : 82-89。
- [—. “The Value Trend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Cultural Studies.” *Journal of Nankai University (Philosophy, Literature and Social Edition)* 5 (2006): 82-89.]
- 罗德尼·斯塔克：《基督教的兴起：一个社会学家对历史的再思》，黄剑波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 [Stark, Rodney. *The Rise of Christianity: A Sociologist Reconsiders History*, translated by Huang Jianbo et al.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5.]
- 肖四新：《欧洲文学与基督教》。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
- [Xiao Sixin. *European Literature and Christianity*. Guangzhou: Jinan UP, 2013.]